

梭罗：禽兽为邻

一、农夫

他一丝不挂，只戴了顶圆帽，站在池塘中央。半个小时前，一只蛤蟆从水面某处入水，他盯着那儿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那只蛤蟆从同一个地点浮了上来，只把眼睛露出水面，也盯着他。两个家伙这样对视了一个小时。根据经验，这个时候可以下手了：他折了一片草叶，轻轻地伸向蛤蟆，挠动它的鼻孔——它没有躲避，反而很享受的样子。一段时间后，他把草叶扔了，直接用食指指尖刮擦蛤蟆的鼻子，蛤蟆也没有抗议。最后，他们交上了朋友，他捧起蛤蟆，蛤蟆为了表示信任，接受他递过来的食物。

一个老乡零星地看到了这一过程：“那天早上，我去地里干活。路上看到那个二流子就站在那儿，啥也不干就站在那儿，盯着那个泥潭。我中午干活回来，看到他还在那儿，倒背着手。吃完晚饭，我回到那儿想去看看他走了没，结果他还在那儿盯着。‘你在干啥？’我问。他头也不抬地说：‘我在研究蛤蟆的生活习惯。’就是这块货，成天游手好闲，站在那儿研究蛤蟆！”

这个无赖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。不过思考只是他的业余爱好，他是个纯粹的庄稼汉，其本职工作是农活、木匠活、园艺……干干这个，干干那个。他发明了葡萄干面包；他每年都在村里举行甜瓜大会，他种的甜瓜是镇上最甜最香的；他还把种出的南瓜拉到农业展览会上比赛，以112斤的重量获得一等奖。

作为农民，他对待蛤蟆和青蛙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。但他也爱别的动物，包括老鼠、蛇和鲨鱼。一只土拨鼠吃掉了他八分之一的豆子，他没有遵从老乡的建议射杀它，而是用陷阱把它逮住之后，用儿语教训一顿，然后——虽说有点不光彩——放到了邻居家的地里。他热爱蜜蜂，秋天到野外去收集蜂窝，在一个很大的蜂窝前停下，轻轻敲了敲，喊道：“你好，有人在家吗？”不幸的是，主人们都在家，并且都飞出来欢迎他。我们的哲学家丢掉了平日的冷静，抱头鼠窜。

他不太喜欢社交，“如果在地狱里可以独处，而在天堂里必须和别人聚在一起，我宁愿选择下地狱。”28岁的时候，为了更好地亲近大自然，他借了一把斧头，到树林里砍倒几棵松树，建了一个小木屋。在那儿，他隐居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。当然，他的名字并不叫“光头强”，虽然光头强也砍伐树木并在林中独居。这位思想家名叫亨利·大卫·梭罗。为了对他的孤僻性格做全面了解，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。

二、学者

梭罗的家人虽然算不上古怪，但都是个性鲜明、敢作敢为的人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，他的姥姥一家属于效忠英国的少数派，结果家里的成年男人都被关了起来。他姥姥将一把锉刀藏在面包里送进牢里，让家人越了狱。梭罗的妈妈辛西娅也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她是镇上废奴协会的创始人之一，在那时，营救黑奴可是犯法的事情。她特别爱说话，有一次她从海边度假回来，牙和舌头都晒黑了。她爱说话这一特点遗传给了梭罗。梭罗的父亲倒是个无聊沉闷的人。梭罗的姑妈、姨妈、舅舅、哥哥、姐姐和妹妹都信奉不婚主义，所以家族的香火到他这一代也就断了。

1817年7月12日，巨蟹座的梭罗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，上面有一个姐姐海伦和一个哥哥约翰，下面有一个妹妹索菲亚。关于他的童年，我们知之甚少，据他自己的回忆，发生过这样几件事：他穿着姐姐的红裙子在门口学走路，一头奶牛把他挑起来扔到天上；他用斧头把自己的脚趾头剁去一根；一只母鸡为保护小鸡把他撞倒在地；一头公牛从他面前经过，瞟了他一眼，然后踢了他一脚。长大之后，他满怀情意地回想起这头牛，就跟它是他的初恋情人似的。

梭罗在16岁时进入哈佛大学，差一点就没考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有了关于他比较清晰的记录：梭罗身高170，头小手大，腿短胳膊长，胳膊上覆盖满了汗毛，像穿了黑色毛衣；鹰钩鼻，大大的蓝眼睛，头发蓬乱，裤裆牵拉到膝盖。后来为了暖和，他还蓄了大胡子，并且只穿灰色的灯芯绒裤子，因为脏了也看不出来，他可以一年只洗一次，而且可以随意地在草地上打滚。简而言之，大家都说他丑。

梭罗在哈佛时成绩中等，也没有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同学们说他走路时总爱盯着地面看，神情冷漠、严肃，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法官”。虽说成绩不杰出，但他热爱读书，最喜欢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和古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。犬儒主义倡导生活中的极简主义，将欲求和装饰降低到最低限度；斯多葛哲学主张人生本为悲剧，应该只求为人刚正、内心平静，不求飞黄腾达。梭罗亲身实践这些信条：那时的哈佛大学跟野鸡大学一样搞创收项目，规定本科生毕业三年之后交五块钱就能领到硕士学位证书，不必在校读书，只需做到大学毕业之后能再活三年，但梭罗对此不屑一顾；当康科德的居民热烈欢迎州长前来视察时，他跑到五金店买了第二个门栓，把大门关得死死的。

只有坚守原则才能培养出个性。从哈佛毕业之后，他在镇上的中心学校当教师。在当时经济危机的情况下，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是天上掉下的美差。然而，学校强调死记硬背，并且要求老师责打学生，这与梭罗自己的教育理念相悖。于是，他在教了两周之后便辞去教职，这一工作很快被他同学抢去了。他试图到别的地方当老师，但工作岗位不多。没有办法，他干脆和哥哥一起自办

学校，维持了两年。那是美国第一所成功的现代学校，在那里不强调死记硬背，每周至少两次野外考察；课间从10分钟延长到半小时；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片花园。而且学生与老师是朋友关系，学生也敢于开老师的玩笑。有一次，孩子们发现日历上画着一条鲑鱼，他们把图片剪下来传阅着看，因为它长得像梭罗。

学校里有个11岁的埃德蒙·西沃尔，他得到了梭罗的特别关照，原因是他有一个17岁的漂亮姐姐艾伦·西沃尔。艾伦不是本地人，当她到康科德拜访时，哥哥约翰和梭罗都爱上了她。兄弟俩带她去看长颈鹿，陪她散步、划船。梭罗在爱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，因为他不肯迁就：他教训艾伦不该喝咖啡和茶，并且拒绝陪她去教堂。当哥哥向艾伦求婚时，艾伦惊讶之下答应了，事后才意识到她爱的是弟弟。但她爸爸认为梭罗兄弟都是不信耶稣的不良青年，逼艾伦反悔。于是艾伦便毁掉了和约翰的婚约。三个月之后，梭罗向她求婚，她也予以回绝——这倒在梭罗的预料之内。两年后，艾伦跟一个牧师订了婚，婚后生活幸福美满，梭罗与艾伦的丈夫也成了朋友。这段爱情往事在《瓦尔登湖》的开篇处隐秘地提及：“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狗，一匹马和一只斑鸠。”狗指的是小朋友埃德蒙，马指的是他哥哥，斑鸠指的是艾伦。约翰在一年多后因感染破伤风去世。

萧伯纳在年轻时读了梭罗的传记并成为他的信徒。萧早期的戏剧《康蒂妲》演绎了这出爱情故事：具有反叛精神的诗人尤金寄宿在循规蹈矩的牧师莫雷尔家里，牧师的妻子康蒂妲与诗人渐生情愫。最后，诗人要康蒂妲在他和牧师中间做出选择，康蒂妲选择了后者。出人意外的是，萧伯纳将诗人表现为最终的胜利者：他走出牧师家，吹起了快活的口哨。康蒂妲的拒绝帮他做了一个他不忍心做出的决定——他失去了爱情，却获得了自由。

梭罗的独身主义从此形成，他开始嘲笑爱情，拒绝跟年轻姑娘们来往，说她们浅薄，跟她们说话就像对着云朵说话一样。婚姻也不咋地，他的其中一句格言是：“听老婆的话，然后反其道而行之。”诗人艾勒里·钱宁把妻子气回了娘家，梭罗便跑到他家庆祝，两人在门口举行娱乐节目。他更喜欢小女孩和中老年妇女。他在日记里称姑娘们为他的“仇敌”。后来，一个叫苏菲·福特的姑娘相信他俩是天生一对，向他求婚并且以自杀相要挟，梭罗的回信上只有一个字：No。现代评论家认为，梭罗如果结了婚，也会是个人杰，但绝对不会是那个在瓦尔登湖隐居并且跟政府对抗的人。

三、隐士

1845年7月4日，28岁的梭罗搬入了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，开始了他最为著名的生活实验。白天，他种田、劈柴，写作《河上一周》——那是他用来怀念哥哥的一本游记。晚上，他泛舟湖上，在黑暗中吹笛子，或是在瞌睡中钓

鱼。他吃自己钓的鱼和种的豆子、土豆。他在一块较薄的石头上烤面包，往里面加入葡萄干，这一发明让镇上的主妇们惊讶不已。

来拜访的朋友向我们揭示了梭罗的隐居生活其实是非常热闹的，17岁的弗里德里克·威利斯这样回忆：“梭罗在跟奥尔科特先生谈论瓦尔登树林的野花，突然停下来：‘大家安静，我要你们见见我的家人。’他吹了声低沉的口哨，立刻就有一只土拨鼠从附近的田沟里跑过来；然后是第二声口哨，音调稍有不同，一对灰松鼠也跑来了；第三声口哨，好几只鸟飞了过来，包括两只乌鸦。我记得乌鸦停在他的肩膀上，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，因为这种鸟最怕人。他用手喂它们食，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抚摸它们。然后他用不同的哨声一个个地将它们解散。”

梭罗最爱的宠物是他的室友：一只老鼠。那只老鼠和他分享面包，他一吹响笛子，老鼠就从洞里钻出来，爬上他的鞋子，钻进裤子里，抓着他的腿毛不放，痒得他咯咯笑。他讨厌视觉艺术，墙上唯一一幅画就是他和那只老鼠一起生活的“合照”。

隐居期间，他经常去镇上办点杂事。1846年7月，他到鞋匠家去取修好的鞋子，遇到镇上的收税官萨姆·斯特普斯，要他把6年的人头税补齐。“亨利，”萨姆很友善地说，“你要是没钱，就说一声，我帮你垫上。”梭罗回答说这是原则问题：他拒绝交税，因为他对美国政府支持奴隶制和入侵墨西哥不满。萨姆叹口气：“你这样迟早会被关起来。”梭罗回答：“我现在正好有空。”于是，他就被关进了牢里，当晚兴奋地没睡着觉。第二天，姑妈帮他把税钱交了，萨姆来放他出狱，他抓着门拒绝出来，说税钱不是他交的，不能算数。萨姆威胁道：“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就只能找人把你拖出来了。”梭罗只好认怂。在路上，他遇到爱默生，后者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进监狱？”梭罗反击：“你为什么不进监狱？”

1847年9月，他完成了《河上一周》的终稿以及《瓦尔登湖》的初稿，在湖边住了两年多后，他搬出小木屋，重新进入人间。

然后他就死了。

四、旅行家

在某种意义上，他的确死了。且不提国外的读者，即使在美国人的印象里，梭罗也只是一个抽象符号，其生平鲜为人知。有一个笑话说梭罗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：上半辈子在瓦尔登湖隐居，下半辈子一直在蹲大牢。虽说他生活得很精彩，却很少有人了解他。

梭罗离开瓦尔登湖的直接原因是：爱默生要去欧洲做巡回演讲，家里缺少

一个主心骨，便请梭罗来当管家。与大多数伟人之间的友谊一样，这对师徒兼朋友的关系也是磕磕碰碰，起起落落。好在两人是君子之交，再加上爱默生温和大方，多加忍让，所以不致破裂。爱默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智者和圣人，梭罗则始终是个冷嘲热讽的愤青。有时爱默生也乐得给他捧人，有意激怒梭罗逗自己开心。当他自豪地宣称：“我们哈佛大学有所有学科的分支。”梭罗就气哼哼地说：“没错，都是枝，没有根。”爱默生谈起美国缺少大诗人，梭罗不同意，说他早上在草丛里遇见一位，但是浑身长满了羽毛，而且没上过哈佛。

爱默生比梭罗大14岁，两个人长得像，说话也像。人们都认为梭罗有意模仿爱默生，只有梭罗他妈不同意：“瓦尔多（爱默生）说话的腔调多像我家亨利啊！”梭罗身上有爱默生羡慕的优点，比如灵巧、实干。他什么农活都会，对奶牛瞥一眼就能估摸出重量来，而爱默生笨得锄地时都会铲到自己的小腿。爱默生夫人曾抱怨家里养的母鸡把她种的花园给刨坏了，梭罗就给母鸡们缝制了手套，给它们戴上。他给爱默生的孩子们制作柳笛，讲小鸡和蚂蚁的故事，还变戏法：把铅笔插进耳朵里，从嘴里掏出来。爱默生的孩子们如此喜欢他，问他：“梭罗先生，你来当我爸爸行吗？”

梭罗和爱默生的友谊因《河上一周》陷入危机。由于没有人愿意出版这本书，爱默生便建议梭罗自己掏钱出版。梭罗同意了，但书的销量惨不忍睹。印了一千册，卖出几十本，免费送了很多，剩下的七百多本全都积在梭罗的卧室里。于是诞生了梭罗最为有名的一句隽语：“我有九百本藏书，其中七百本是自己写的。”打趣归打趣，他心里不免埋怨爱默生不肯为他大力推销。爱默生一方面对其门生的不思进取和微小成就感到失望，“梭罗缺乏雄心壮志……他不肯当美国工程师的头领，而要当采浆果队队长”，另一方面也对他过于精神化和缺乏人情味失去了耐心，“梭罗好像没有胃，既不吃也不喝。一个分不清冰淇淋和白菜的味道，连葡萄酒或啤酒都没尝过一口的人，你还指望跟他有什么共同之处呢？”“我宁可抓一根榆树枝，也不愿去挽梭罗的手臂”确实，梭罗对一切享乐都不感兴趣：不近女人，从不读小说，厌恶美食，讨厌酒、咖啡、茶，村里人传说他甚至连水都不喝。因为梭罗过于冷峻，所以孟丘尔·康韦打趣说：“瓦尔登湖的深处潜伏着一个险恶的妖王之女，她把梭罗的生命给勾走了。”

为了偿还因出版《河上一周》所欠下的债务，梭罗不得不努力干活。这些年来，梭罗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，被村里人视为无赖和痞子。他住在父母家里，但并非啃老族，他交住宿费，并且帮父亲经营铅笔厂。他赚钱的方法是给村里人干杂活，比如造烟囱、安壁炉、修剪篱笆，当油漆工、园丁、木匠，测量土地，帮人种树。他有时也挖大粪、清理厕所，一次能赚7毛5分钱。村里人不明白，这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。他也从不参加同学聚会，跟老同学一刀两断。他倒是更喜欢动物，每到春天总是开心地通知村民们蓝鸟回来了。

一个到梭罗家送信的孩子这样描述他：“村里人都说，这个怪人写了本书，一本也没卖出去，一千多本都堆在他妈妈的房子里。我的姑姑让我去给梭罗夫人（他妈）捎个口信，来开门的正是这个怪家伙。他站在门口，头发蓬乱，眼神呆滞，好像在望着远方，衣服脏乱好像野地里的流浪汉。我偷偷往他身后看，想瞧一眼他那一千本一模一样的书。”

梭罗在《没有原则的生活》中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辩护：“永远向下看的人，伟大不会接近他；那些向上看的人，他们正在变穷……多数人谋生只是生活的套路，仅仅是权宜之计，而且逃避生活的正经事：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也因为他们不想知道。”上帝命令西方人要工作六天，休息一天，梭罗把这个模式倒了过来：他每周工作一天，休息六天。他说自己一年只干六个星期的活计，剩下的时间自由支配：上午读书、写作，下午去野外散步。他最讨厌散步时遇上村里人，因为他不愿打招呼和闲聊：“我宁愿给他钱让他走，也别坏了我的下午。”二十多年下来，他写了6本书和14卷日记，这些都是现代人的宝藏，充满了反对科技和大众媒体，倡导极简主义生活和亲近自然的现代思想。

梭罗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旅游上，称之为“自然考察”。他专门定制了一套很丑但耐穿的衣服，还设计了一种有隔层的帽子，沿途摘的花和昆虫就放在里面，因为头皮既保湿又保温。在旅行方面他也有原则，比如坚持步行，并且绝对走直线：遇山爬山，遇水淌水，绝不绕开。在空旷的大草原上，一家农舍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为了遵循直线原则，他毫不迟疑地把前门踢开，穿过客厅，从后门出去，那一家人正在吃饭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偶尔梭罗会在路上遇到他的儿子：一只冻僵的青蛙。他把它放进口袋里，希望它能缓和过来。他喜欢光着身子，只要遇到小河，他就脱光了衣服，裸着身子淌水前进。一次暴风雨过后，大海在沙滩上积出一个小水洼。他和诗人艾勒里·钱宁下去游泳、玩耍，半个小时之后才发现水洼里还有一位游客：一头大鲨鱼正咧着嘴冲他们微笑。这两个人不识抬举，也不回笑一下，便急急忙忙地爬出了水洼。

五、不朽者

梭罗37岁那年，经过7年反复修改的《瓦尔登湖》终于面世了。它的命运比《河上一周》好一些，一开始就受到好评，不过，这本书在梭罗死后也被人遗忘，直到二十世纪它才重新受到了关注，其影响在当今的消费时代和生态危机时代愈来愈重要。和所有的经典一样，这本书大名鼎鼎，但鲜有人问津。关于它的不可读性有种种传说：一位中文译者说只有夜晚静下心来才能读进去；也有人说必须上了岁数才能读懂它。即使美国的精英们也发现它难读，《纽约客》的专栏作家凯瑟琳·舒尔茨说应该把《瓦尔登湖》从经典中剔除出去，因

为这本书不仅有厌世的倾向，而且十分枯燥乏味，尤其是开头的“经济篇”。

但问题在于，这本书是由梭罗的演讲稿整理而成的，他已经在众人面前试读过几次，而且效果颇好，很多听众表示笑得肺疼。这样说来，《瓦尔登湖》不应该受到上述的责难。学者们过于强调其经典性，不太愿意提及梭罗作为讽刺家和幽默家的一面。其实，书中每一页都有引人发笑的文字。关于女性时尚，他说：“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帽子，全美国的猴子都跟着学样。”他讽刺慈善事业：“如果我掉在沟里，有人拉起了我，对我来说他算不得好人。我可以找一条纽芬兰狗给你看，它也做得到。”梭罗最擅长的是自然描写，在“禽兽为邻”和“冬天的禽兽”中，他讲述自己如何花了一天时间跟潜鸟捉迷藏，以及如何跟猫头鹰对视半小时，还说“它是猫的有翅膀的哥哥”，令人忍俊不禁。梭罗的修辞手法已从“拟人”升级为“泛灵化”，他写道：“瓦尔登湖沿岸的石头格外清晰可见，仿佛这湖把它的牙都呲出来了”；他把家具拖出木屋，好擦洗地板，后来桌椅们“在外面玩得很开心，都不愿意回到屋里去了”。当冬天来临，湖上的冰冻裂了发出声响时，他说瓦尔登湖是他的床伴，它烦躁地翻了个身，然后放了几个屁。

如后人所知，《瓦尔登湖》是一本关于亲近自然的书，但它首先是一本关于人如何正直生活的指南。一直以来，西方的文人和艺术家们为生存问题面临两难的处境：要么卑躬屈膝，拜倒在政府和权威的宝座下，成为体制内的一员；但难免吃人的嘴短，拿人的手短；要么直接诉诸市场，但不得不以通俗的方式迎合大众。梭罗发现了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：简单生活和体力劳动。像契诃夫的小说《我的一生》中的“小利钱”一样，梭罗为了追求独立，放弃了“脑力劳动”。思想家们一面攻击社会分工造成人的异化，另一面却暗自庆幸自己终于“出人头地”爬上社会上层，可以整天思考而不用从事体力劳动，这或许也是一种奴役他人和自己的方式。

正是因为自食其力，梭罗在面对权贵和出版商时才那么硬气。在人格方面，他和斯宾诺莎一样高尚，后者宁愿以磨镜片为生，拒绝了海德堡大学的教授职位。正是靠着自食其力，他才能在面对不幸的命运——默默无闻——时显得那么平静。没错，他和叔本华、尼采等人一样，生时的名声几乎完全被埋没。当叔本华背靠着父亲的巨额遗产咒骂世人眼瞎时，当尼采为自己导演一场场出名闹剧时，梭罗平静地劳作着、省吃俭用着。

应该说，梭罗对后世的影响要比在当世深远得多。他不仅影响了精英阶层，甚至出现在了大众文化中。很多电影里都有梭罗的影子，比如美国的《死亡诗社》《神奇队长》、法国的《未来的事》，后者还把一个镜头给了梭罗的画像；而且，梭罗似乎是当今直播界或短视频平台“三农领域优质创作者”和“萌宠领域优质UP主”的鼻祖——不过，也只是“似乎”罢了，毕竟梭罗是个原教旨犬儒主义者和斯多葛主义者，对名声、财富、时髦、大众媒介、科学技

术和流行之物都极为排斥。梭罗直接与现代社会对话，为人类的艰难处境提供出路。当贪欲弥漫整个世界，我们告诉自己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开心时，梭罗明确宣布他走的是另一条路径：将欲望减至最低；只有做减法，人才能生活得有尊严，才能变得智慧而快乐。作为一个生态文学作家，他的贡献在于记录了一个正在迅速逝去的青山绿水的年代，那时随处可见土拨鼠、红胸鸟、猫头鹰、鼠尾草、野生兰花……他的作品对于当代人类环境不啻为一种警示：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只有在书上才能见到我们司空见惯的生物了。

因为缺少读者，梭罗也曾痛苦过。不过，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一处境，觉得默默无闻也有好处，可以保证他思考的安静。到了“晚年”，村里人开始尊敬他，他也变得温和了，在路上经常跟村民闲聊。他努力帮助逃到北方来的奴隶，甚至给他们搓澡、擦洗身子。父亲卧病在床，梭罗无微不至地照顾他，母亲惊讶地说：“我这时才知道我家亨利是个多么温柔的孩子。”父亲去世后，他跟母亲、妹妹还有姑妈过着平静的生活。

43岁时，他在大冬天里去数一棵树的年轮，于是引发了肺结核。他病得不能外出了，只好躺在床上修改以前的手稿。他身体衰弱了，却变得更加幽默机智，也多了份温情。当圆脸、肥胖的姑妈来看他时，他说好像看到月亮升起来了。姑妈最后一次试图拉他入教，按照基督教的传统，问他跟上帝讲和了没有，他回答：“我们从来没有吵过。”梭罗在晚上经常失眠，但他拒绝服用鸦片助眠，只让妹妹把蜡烛点着，这样他可以整晚看家具们的影子在墙上跳舞。听说村里的孩子在掏鸟蛋，他把他们叫到床边加以训导。一个流浪歌手在大街上用风琴演奏梭罗小时候听过的歌曲，从不哭泣的他热泪盈眶地大声喊：“给他点钱！给他点钱！”梭罗微笑着迎接死亡，说他打小就为最后一刻做准备了。1862年5月6日，梭罗安详辞世，享年44岁。

当朋友告诉他知更鸟已经来报春时，他高兴地说：“是啊，这个世界多美丽。不过，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更美丽！”